

目前最广泛使用的学术评量系统以英语为主,两岸四地的中文期刊因没有一个能全面覆盖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研究成果的引文索引,也没有公认的影响指数,致使中文论文在国际学术界欠缺认可度,极大影响了中文人文与社会科学著作的地位。

# 中文论文如何迈向国际化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东部某“985工程”高校校长从2008年起陆续引入了30多位搞经济学的海归。他们学术水平高、论文成果丰硕,但唯一令该校长烦恼的是,海归们在瞄准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时总会遇到两个问题: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就一定要用英文写作,要用英文发表就一定要去研究英文世界的课题。

“我很苦恼的是,引进30多位海归无法把引领国际学术的本事用在引领中国的问题上,从长远来说,这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是有损失的。”这位校长不无遗憾地说,研究中国问题采用中文写作反而不可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学术评价的定位问题。

他的困惑使得学术界的一个老问题浮出水面——以中文发表的论文该如何获得国际评价。

11月18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台湾大学作为发起院校,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共32所院校签署了《推动学术中文合作协议》,致力于该问题的解决。

## “多此一举”的投稿

如果只是出于职称考虑,内地高校社科人文学科的教师将论文发表在CSSCI、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认定的核心期刊上也足够了。但是,所研究的学术想要更上一层楼——在国际上取得影响力,却是难上加难。

为了追求国际影响力,中国的学者往往会怎么做呢?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他表示,一些学者只能将中文学术成果写成英文,投往列入SCI等系统的刊物。“这些论文主题基本上属于中国或汉语圈,读者也基本上是中国人或懂中文的外国人,这样做并无必要,就连研究这些领域的外国学者,包括母语为英语的学者也认为多此一举”。

事实上,这样做有时候并不讨好。一位研究政治学的校长指出,讨论“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受政府干预”这类文章在英文杂志上是没法发表的,而且,许多重大的中国政治学问题变成英文文章明显不符合学术规范。即便退一步在英文期刊发表中文文章,也只能算作地域性的学术报告,基本上不具有实际作用。

况且,很多学术研究领域更适合以中文为语言载体。如中国的经史子集,它根植于中文研究,以此为基础生长出期刊,“一定是以中文为载体更为合适,然后再推向全世界,以合适的载体传播。”山东大学副校长胡金焱说。

作中文研究用中文发表,反倒无法取得国际影响力,这看起来是个悖论,但却发生在人文社科甚至部分自然科学(如中医)领域。

事实上,有关语言限制的突破在自然科学领域可见一斑。19世纪至20世纪,当时德国是科学的重镇,最好的科学论文是用德文写作。不久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其大部分的论文也是用中文发表的。

“这说明语言并不是障碍,用中文发表不会阻碍学者在科学的制高点上取得高评价。”胡金焱说。



中文学术评量与发展高峰论坛现场

图片来源:香港中文大学网

那么,它真正缺失的又是什么呢?

## 孕育新标准

作为全球五分之一人的共同语言,中文有其不容忽视的国际影响力。然而,“目前最广泛使用的学术评量系统以英语为主,两岸四地的中文期刊因没有一个能全面覆盖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研究成果的引文索引,也没有公认的影响指数,致使中文论文在国际学术界欠缺认可度,极大影响了中文人文与社会科学著作的地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说。

记者了解到,两岸四地的中文学术评量体系主要有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TSSCI)和台湾人文学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等。

这些学术评量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客观、公正,但却无法克服制度设计带来的弊端。如CSSCI无法摆脱片面追求定量数据的困扰,TSSCI坚持匿名审查制度,带来发文少、篇幅长、审稿人权力过大等问题。因此,从已有的中文学术评量体系中,升华出一个新的评量体系,成为了与会高校的共识。

据沈祖尧介绍,中文学术评量体系或将采取“两条腿走路”。在原有各家学术评量体系的基础上,先形成32所院校认可的两岸四地优质中文期刊名单;进一步争取更多中文学者的认可,将两岸三地的标准提升至国际化标准。

然而,国际化标准并不是说建就建。一方面,国际化标准有自身的门槛。葛剑雄表示,所谓的国际化标准,要看有没有中国以外的意义。如研究中国哲学,有没有中国哲学以外可供借鉴的成果。“它是从事实中提升出来的、

形而上的、有一定普适价值的成果。”

另一方面,本土问题也可以有国际影响。如对周易、传染病等的研究,也能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用澳门大学全球事务总监兼校长特别顾问冯达旋的话说,很多人文问题看似本土问题,其实不然,“除非躲在岛上不看新闻,不然你会发现中国的发展每天都在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能否形成国际化标准,尽管不少与会者持乐观态度,但仍待实践去检验。

## 以量代质是否仍将继续

建立一种新制度,人们往往希望一并革除旧制度的弊病。在会上,让校长们最为忧心的一个问题是,在新的学术评量体系中,如何克服论文发表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问题。

事实上,片面追求数量的问题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

香港中文大学常务副校长华云生指出,中外的评量体系都喜欢用量化去表现一个很漂亮的图表,借此告诉人们学术的高下。

葛剑雄则认为,片面追求数量并不是由评量体系本身设计不科学所造成的,相反高校在追逐各项行政评比的过程中催生了论文的快刀操作。

如何跳出“以量代质”的怪圈,华云生认为,与其看引文索引,不如看影响因子。在学术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是测度期刊的学术水平乃至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

说到破解“以量代质”,更多的人把希望寄托于“同行评议”。据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陈锡水介绍,台湾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量制度的演进,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把数据库和评价分开来。在2016年即将推出的新系统中,其专家审查占50%,同行问卷占30%。

然而,同行评议在具体的执行中也让业界

颇为苦恼。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若干不规范现象。比如,由于收到的论文数量众多,一些审稿人仅根据对该期刊的主观印象打分,并不看文章内容;论文寄给了并不熟悉该领域的审稿人,审稿人凭主观意志打分;给评审人的时间过短,使其不得不采用一些快速审稿法等。

“问题不出在制度,而在于做法。”葛剑雄解释,如能找到合适的评委,没有人会愚蠢到只看期刊打分;遇见不懂行的人胡乱打分,可以在专家库中将此人删除;给予评审人充裕的时间,评审人不至于仅凭个别指标快速下结论。

陈锡水对此表示赞同,他同时指出,定性评价没有万能的方式,但仍必须建立起同行评议的风气、习惯,“如果大家都投入,每个人的负担就不会那么重;如果大家不投入的话,就变成少数人能决定的事情”。

随着两岸四地中文学术评量体系的建立,在同行评议上或将带来新曙光。台湾大学校长杨泮池表示,过去分区区域使得评审的专家较少,未来两岸四地合作,专家库可以铺得更广,“我相信,论文、著作的质量可以得到更客观、全面的评估”。

## 急事与缓事

在采访中,有不少高校、媒体都在催问两岸四地中文学术评量体系的“时间表”。

杨泮池给出的时间表是1年。“最重要的是把高水平的中文期刊标准设定下来。通过吸引期刊进入,提升水准,进而向全世界推出一批高品质的学术刊物。”

伴随着“十三五”期间,内地近1万种期刊大调整,一部分品质不高的期刊将退出,一部分期刊又将进入的浪潮,尽早出台新标准,对于新进入的期刊从一开始就按新标准执行,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中文论文增长数量迅速,中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团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团体之一,也急需一个国际化标准,提升中文研究成果的国际学术地位。

对于以上两点,建立新的中文学术评量体系的确是急事。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要“马上办”。比如,对于交叉学科的论文评量。

北大图书馆馆长朱强表示,交叉学科的论文评量一重难度来自于论文本身,交叉学科论文目前尚无专门的评价标准,将其归入所涉的多个学科中评价,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与该学科有关的内容并非前沿,导致论文无法得到客观评价。

另一重难度来自于衍生出来的期刊,现行的评量体系仍然坚持的是以刊代评的思路,新生的交叉学科衍生出的刊物也是少数,“所谓的核心期刊是一群期刊里的若干核心,它本身无法成群,又何来核心呢?”朱强说。

对于交叉学科的评量,葛剑雄认为,交叉学科成果被承认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成果需要有检验的过程,匆忙承认不见得是好事。除非已经形成了新学科,否则没必要专门为它制定标准。“因此,研究交叉学科的学者须在心态上作好准备”。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左一)正在观看参赛选手演示作品。

性之外,评委们还要考虑作品质量、用户体验,甚至文档的演示和讲解过程都是影响打分的因素。“这其实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软件的创新大赛还要从实用性考虑,只有创新而没有考虑完成度等其他问题,我不认为可以获得大奖。”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热潮的背景下,创新与创业的关系成为大家必谈的话题。对此,作为一名本科生,汤晓旭的回答显得非常成熟。在她看来,“创新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有创新不一定要创业。是否创业要看个人的经历以及对未来的目标定位,应理智和谨慎一些”。

崔晓晖对此十分认同。他说:“创新和创业是不一样的,创新是无时无刻不在创新,而创业不仅仅提供技术方案,更多则有赖于创业者的管理能力、个性、背景,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创业。”

倪光南和何京翔都认为,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浪潮中,中国的人才、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全球都是居于第一梯队的,不输于欧美。

何京翔希望,无论是创新还是创业,同学们都能够“在这个云计算、智能互联的时代,做时代的新主人”。

## 现场

# “做云时代的新主人”

——第八届“英特尔杯”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侧记

■本报记者 计红梅

“Chpoi”“Minecraft”“Star of stars”……11月15日,当身为主持人的天津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孟昭鹏颇感费力地念出这些拗口的名字时,走上台的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20支参赛队伍的选手。

自4月8日开赛第八届“英特尔杯”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终于在当天圆满落幕。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对这次大赛的评价是,“比赛的主题非常前沿,体现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精神,也符合‘互联网+’的要求。”英特尔公司亚太研发中心总经理暨软件与服务部中国区总经理何京翔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次的参赛作品“超出了我的预期”。

## 来自生活的创意

梁昊是中南大学软件学院的学生。在第八届“英特尔杯”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开赛前,他不小心丢了钱包,而这却成了他们团队此次参赛作品创意来源,“为什么不能像取电影票那样验证身份信息,提取现金,取火车票呢?”11月14日,此次大赛决赛现场,梁昊告诉记者,他和刘柳燕等其他三人组成的“The One”团队基于云计算和识别技术开发了电子钱包App“A-Level Wallet”,希望能把用户的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的个人信息数字化后安全地存储和使用。“我们的创意来自于生活。”他们自豪地说。最终他们的作品获得了此次大赛的一等奖。

和“The One”一样从生活中寻找创新灵感的团队还有很多。来自上海交大的Time团队,凭借他们开发的“Real Detector”智能坐姿矫正平台“最终摘得大赛特等奖”英特尔杯”,同时获得“最具企业潜力奖”。这项荣誉给他们带来了3

万元的奖金和到英特尔实习的机会。汤晓旭是Time团队的队长。她告诉记者,他们创意的出发点是关注生活中困扰人们的问题,最终发现了颈椎痛这一因坐姿而带来的麻烦。“我们查了一下,全国大概有10%的人口在遭受颈椎痛的困扰,而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产品解决这样的问题,于是我们决定,不如自己做一个。”

与Time团队不谋而合,北京邮电大学Hayate团队也开发了类似的应用。他们使用普通的3D体感摄像头,捕捉人体的角度形成节点信息,生成人体骨架,提醒人们不正确的坐姿。

为什么同样是坐姿矫正类应用,Hayate团队最终只获得了三等奖呢?英特尔感知计算事业群中国区总监汤振宇告诉记者,这两个应用主要的区别是,Time团队的作品在使用电脑的同时就可以随时监控坐姿的正确与否,而Hayate团队的应用则需要把线拉到一两米远的地方。“评委们经过白热化的讨论,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利用技术创新的时候,不能生搬这个技术,而是要利用技术内在的特点以自然的方式满足用户需求。”

## 本土人才也优秀

“英特尔杯”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示范性软件学院联盟主办,天津大学软件学院承办,英特尔公司提供全方位支持。本届大赛的主题是“云计算”,首次尝试应用OpenStack开源云计算平台,鼓励选手采用英特尔RealSense 3D体感技术,设计感知计算领域的创新作品。

决赛现场,倪光南逐一观看了选手的作品。他表示:“与我这段时间参加的许多软件大赛相

比,此次大赛有两个特点,一是主题比较集中,主要围绕云计算和3D实感技术;二是非常前沿,对于大学生而言这两者都是很新的技术。”

“这次比赛的题目应该说略难了一些。”已多次参与“英特尔杯”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的孟昭鹏说。

而对汤振宇而言,学生的创新能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参赛的大学生很多是本科生,但他们的想法却超出了条条框框。在英特尔工程师们的指导和帮助下,他们很快就掌握了最新的技术,带给了我们出乎意料的惊喜。”

本次大赛评委组专家组长、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院长崔晓晖注意到,这次很多项目通过结合英特尔最新的实感技术,开发了诸多教育、医疗、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应用。许多项目还包括了成熟的商业计划、完整的推广与运营模式,体现了大众创业的时代特征。

由本次大赛谈到本土人才培养问题时,何京翔表示,英特尔亚太研发中心有7位首席工程师,他们都是英特尔的技术领军人物。而他们中没有一位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全部是本土培养的工程师。“谁说我们国内大学培养不出来的人才缺乏创新?”何京翔反问,“关键是怎么去引导,怎么去培养,怎么提供能够创新的环境。”

## 创新与创业

创新无疑是这次比赛的“关键词”。崔晓晖告诉记者,此次大赛评选最关键的指标就是思维是否创新。

而评委之一的英特尔开源技术(上海)Android操作系统研发经理冯晓焰补充,除了创新

## 中国大学评论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世纪之梦。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推出“211工程”“985工程”,以加快推进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985工程”“211工程”的实施,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我国部分重点大学和学科,取得比较突出的建设成绩。但是,正如国务院在下发总体建设方案所提到的,以前的重点建设方案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式。

一直以来,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采取计划手段,把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高校。这是集力量办大事的思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随着“985工程”“211工程”的推进,列入这两个工程的高校获得了国家大量的财力投入。这些高校在获得国家重点投入时,也作出建设一流大学的承诺,甚至还列出了具体时间表。但是,这些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引来诸多争议,主要问题是,北大、清华等高校近年来能拿得出手的一流大学建设成绩单,主要集中在科研方面,而科研成果也主要体现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由于论文发表数大幅增长,北大、清华等校在一些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上名次有所提前,可一流大学不是排行榜中的大学,也不是论文中的大学。重视学术研究且是发表论文的学术研究的大学,不但偏离了大学的基本功能(培养人才),而且变得功利而浮躁——大量论文并不具备原创价值,只有评职称、申请课题、项目验收的用途,教师往往忙于应付科研任务,荒废教学,导致学生和社会公众对大学办学极为不满。这次,《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要“构建完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科教协同育人,完善高水平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针对办学中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问题,重新理顺科研和人才培养的关系。

总体而言,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缺资源(长期来学校一直抱怨缺钱缺人才)的问题已经不是特别突出。以资源为导向的一流大学工程,只会加剧功利化和行政化,当前最缺的其实是基本的办学制度。好的办学制度才能让资源发挥作用。在笔者看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着力解决两方面问题。

一是政府部门要转变计划思路,从过去在资金、政策上给予部分高校重点支持,转向建立平等的竞争环境,鼓励高校在竞争中形成特色、办出一流。不得不承认,虽然“985工程”“211工程”对改善大学的办学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它给中国教育带来的负面建设,不容忽视。大学被分为三六九等,破坏了平等竞争,基础教育方面则名级情结严重,高考焦虑没有随招生录取率提高缓解反而加剧。

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关于废除“985工程”“211工程”的呼声,建立市场竞争机制。从全世界范围看,一流大学从来不是靠计划打造的,而是在竞争中形成。各类行政计划、工程的本质是对大学进行行政治理。《方案》提出,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更加突出绩效导向,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对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适当加大支持力度;对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适当减少支持力度,用意就在于打破以前拨款“终身制”,一定程度引入竞争机制。希望能切实落实,以此激发高校的动力和活力。

二是学校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近年来,我国大学频频曝出教育丑闻和学术丑闻,这都因没有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学校办学由行政主导,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不分,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没有管理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权力,大学的办学被行政和利益因素纠缠和干扰。今年北大和清华为抢高分考生、“状元”而开摊,就令网友大跌眼镜,感慨两校斯文扫地。

对于我国大学办学存在的问题,国家在制订教育规划纲要时已有深刻认知,进而提出了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的设想,要求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学校内部完善现代治理。但推进这些改革,缓慢而艰难。这次总体方案,再次提出,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因此,如何落实改革关系到总体建设方案的成败。以笔者之见,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之所以遭遇阻力,根源在于缺乏让政府和学校行政必须放权的改革机制。为此,建立这样的改革机制是我国的当务之急,换句话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关键在于启动教育改革,建立让行政必须放权的改革机制。

这一机制应该有两个要点:一是把教育改革纳入立法程序,由人大立法推进而不能由政府说了算,让改革做到“于法有据”;二是大学内部治理应建立师生参与管理、决策、监督、评价的机制,落实师生在办学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决策权。如《方案》所提,要加快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积极完善岗位设置、分类管理、考核评价、绩效工资分配、合理流动等制度,加大对领军人才倾斜支持力度。这不能只有学校行政决策,而必须广泛听取教师意见。这些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性工作,打好这样的基础,我国建设一流大学就将“水到渠成”。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须引入竞争机制

■冰启